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谢富胜等)  
[信息来源:]

[上传时间: 2006-05-06]

关闭窗口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富胜 周端明 耿继东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指示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2005年1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位经济学家参加了会议,围绕着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的道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现状和发展

####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现状

在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问题上,各位学者正视现实,坦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境比较尴尬。林岗教授认为,实事求是的讲,只要我们不自己骗自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被边缘化了。王振中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的教学和研究处境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老一辈东倒西歪,身体老了,立场变了;教师在教学时语言东拉西扯,很多政治经济学教学语言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学生东张西望。黄桂田教授认为,从政府政策指导思想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被边缘化。但从现实看,大学基础课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是很相称。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在一个很矛盾、很尴尬的地位。范从来教授指出,刘国光教授的谈话讲的确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存在着被削弱和边缘化的问题,南京大学一直坚持在全校本科生中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在首席教授课程中开设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也遇到了很多尴尬的情况。

林木西教授认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时,要注意两个倾向,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理论界和教育主管部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上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经济学基地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培养上做了很多工作;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中,有五六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杨瑞龙教授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来开展教学和科研,始终保持着一支稳定的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在教学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重要位置,例如,在课程建设中,除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外,还开设了《资本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高级政治经济学》等系列课程,在科研上非常重视,创办了《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建立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网,在211工程和“985”二期工程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的原因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的原因时,各位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林岗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有其研究队伍以外的原因,如国外冲击,有背后力量。范从来教授认为过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主义为导向的教学、科研模式,过分注意意识形态领域,而忽视了丰富多彩的经济运行问题,

以至于学生难以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对抽象的理论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黄桂田教授同意范从来教授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

### 3、新形势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胡乃武教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同志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出发研究中国现实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今天，我们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从社会发展两大基本矛盾出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张晖明教授认为大的学术体制需要创新，整个学术体制需要反思，不要独尊，不要经常左右摇摆。简新华教授、韩小明教授等认为防止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除坚持方向、领导权外，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它，回答它。

杨瑞龙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在解决这些新问题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最杰出的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革命性在于创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别结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正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从来教授结合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解释，提出政治经济学必须进行教学模式的变革，应区别教材的编写和专著的编写，教材编写应该把“以主义为本”与“以学生为本”结合起来，让学生从丰富多彩的经济运行问题出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上，胡钧教授指出，是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一些缺点、毛病加以修正，就是发展，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论上进行修正和补充，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键在于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否则既浪费精力也浪费经费。用西方经济学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上是根本不同的，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实践中的运用和推广。孟捷教授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评价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矛盾。而演进经济学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强调协调。他还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现代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存在着矛盾，如何进行修正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林岗教授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通过自发协调，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之间的动态作用实现的。谢富胜博士指出，必须正视西方激进学者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如几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忽视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只在抽象层面上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须从具体的生产力如何改变具体的劳动过程出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认为，终身雇佣制与剩余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采用了新的形式——即结构化劳动控制体系。

###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与会学者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根本的方法论地位，必须牢牢坚持，但同时也承认要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之处。胡乃武教授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简单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可以借鉴。但从根本上，要把两者融合起来，从根本上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林岗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泛滥是一股风，会变成新的教条。它的边际效用理论、生产函数理论以及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都是有问题的，但还在讲和教学生。当然，也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无原则的兼收并蓄，基本原则是必须合乎社会主义价值。经济学是从思想方法上说的，数学仅仅是一工具，数学的使用应该服从于经济思想。王振中研究员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何改革、如何转型的道路，如“双轨制”改革道路、经济特区政策等。这种探索恰恰不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科斯曾经指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私有制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

卢荻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之中，如果追求中国经济的自主

发展，中国经济学必定需要一个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中国追求一个和谐、民主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学术和知识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体系，以及研究对象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自称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起点是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对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没有界定。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体系具有客观的标准，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理论抽象，必须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必然有不同的方面。对这一波全球化，其动力是什么，发展过程怎样，建设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求和内涵是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盲目地遵从西方经济学固然是错误的，但无原则地排斥、敌视西方经济学也是不对的。谢富胜博士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加强对西方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些前沿问题做出新的阐释才有生命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阐释，不仅要说明西方经济学为什么这样解释，为什么被发达国家很多人接受。同时也必须阐明，西方经济学这样解释的局限性。

## 二、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会学者围绕着中国发展道路或模式这个主线，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 1、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 and 实践

林岗教授指出，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模式问题，根本的和核心的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具体的理论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理论和政策的基石。中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如何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尝试，理论界有很多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背景来建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问题并没有解决，理论界目前的工作仅仅是一种描述，而不是一种解释。

宋涛教授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有不少的国有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有很多没有发展，大量亏损和破产。大量国企破产倒闭、数量巨大，如何保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关键是搞好经营管理。他列举了一系列的数据说明，大量外资企业在GDP和进出口总额中占有优势地位，指出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状况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罕见的，与国家命运是否受制于人有很大关系，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刚从美国归来的朱安东博士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以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国有企业作为选题，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有企业是不是一定就搞不好，或者说与私有企业相比是否就一定没有效率，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从理论上讲，从西方经济学是无法推导出国有企业必然是无效率的结果的，从经验数据看，正反结论都存在，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国企主要存在于利润率比较低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但他以世行公布的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国有企业的数据库，利用计量模型却验证了国有企业是有效率的，而且从全球来看，金融资源的净流量是从国企流向国家的，国企并没有造成财政负担。从计量检验来看，国企规模大小与一国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与一国的贫困程度负相关。王振中研究员肯定了朱安东的发言，他特别提到了1993年9月18号江泽民同志在社科院的谈话，关键是如何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对国有企业法人地位的认识，对国有企业的评价是不能和私有企业一样的。他指出，1989年以后，科尔奈认为国有企业既没有必要改造也改造不好，科尔奈的观点对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很大，但世界银行报告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这次保先教育材料中摘录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谈话，“国有企业搞不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会受到影响”，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林木西教授结合沈阳铁西区国有企业整体改造情况，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技术改造和下岗职工安置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需要对成功案例进行总结，上升为理论或规律性东西。

## 2、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阐释和未来发展

林岗教授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之所以与别国不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没变，依托原有宪法秩序为基础。

卢荻教授从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视野分析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他指出，今天的中国不只是经典意义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明确的、迅速的变化——即全球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其空间范围上的扩张，将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选择都是如何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如何力争自主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何追求一种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既是全球化的年代，也是发展失落的年代，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20多年来都经历了经济低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消除贫困没有任何进展。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20多年的发展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这样的成果究竟是如何取得的？他指出，中国1978-1992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49%，随后快速工业化过程主要依赖于国内的大规模需求的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内部消费市场支撑了新兴的一连串的大规模生产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这不仅仅是市场的结果，而是改革前的历史积累，特别是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绝对值很低，但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一个高度资本深化的发展模式，对剩余劳动的吸收能力下降，但人均工业部门生产率却在加速提升，支持了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大型工业企业，除了收入分配问题外，大型工业企业的垄断和社会责任问题值得重视。1998年以后，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工人福利的改进，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目标自然而然地实现，国有企业的发展恐怕还需政治、文化、体制的配合。

刘刚教授通过对天津的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出中国的发展道路，表现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体制特征——特别是生产关系上。范从来教授以江苏发展过程中GDP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不同步为例，指出依靠外资企业发展经济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林木西教授和简新华教授都认为必须发展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才能成为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那么，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这一态势？简新华教授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依据主要是：潜在的国内需求为较快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巨大动力；从生产要素的供给看，能为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提供必要要素。从劳动力要素看，我国正处于所谓“人口视窗”阶段（2005—2025），劳动力数量达到顶峰，抚养比例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短缺已经改观；资源环境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但是是可以克服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国际资源，开源节流；从制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体制日趋完善为其提供了制度保证。因此，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要充满信心。

## 三、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观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理论创新也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问题，围绕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认识，与会学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吴易风教授指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排除非科学发展观的干扰，否则科学发展观也很难落实。一些掌握经济学话语权的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没有增长和发展理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多玛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1928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弗尔德曼首先将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变成数理模型。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是很全面、很系统的，并且相当科学，研究科学发展观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过去，我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片面的理解经济增长和发展，把增长与发展等同，把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有意曲解为

“增长是硬道理”、“GDP是硬道理”，并进一步提出GDP增长最快的手段是引进外资。这种观点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南方部分地区在引进外资上恶性竞争、不择手段，主要表现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接受污染严重的企业；以牺牲国家税收为代价，除了优惠政策外，外资企业逃税漏税非常严重；以牺牲珍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以超低价和超长使用期向外资转让土地；默认外资企业对工人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和各种侵犯工人人身权利

的行为。后果非常严重：生产相同产品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被打垮了，造成了大量失业；整个水系和土壤都被污染了，目前国际上最尖端的技术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市场拱手相让，技术没有换回来，市场换技术是欺人之谈；使许多工人人身受到伤害，数字相当大；每年GDP增加中，外资拿走占了近一半。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问题上，李连仲研究员指出，五中全会最大的创新点是科学发展观，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如何贯彻落实形成了以下几个创新点：（1）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在更加宽裕的基础上建设全面小康，通过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手段解决中国二元结构问题的创新。（2）“九五”规划提出两个转变时，吸收了前苏联的经验，10年来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根本性转变。五中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和体制，淘汰落后的设备、创新技术，要培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职工队伍和管理队伍、提高素质，建立考核指标。宏观上讲的两个转变必须在微观上落实到企业层面。（3）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中心环节。中国目前企业的自主创新存在很多问题，应鼓励研发投入，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李连仲研究员着重提到，和谐社会不是共产党的专利，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在和谐创业、和谐兴国、和谐安邦的基础上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小平同志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提出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政府：政府必须讲诚信、执法严、决策民主化、关注弱势群体。

特别地，与会学者们都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简新华教授认为引进高、精、尖的设备是不太可能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林木西教授用辽宁省的几个事例说明了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取得的成绩，如“东软”医疗设备的案例、沈阳的数控机床产业和鞍钢所搞的循环经济等。王振中研究员提出了如何在具体层面上进行自主创新的问题，即自主创新的具体实现问题。

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寻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使之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现实，解释更多的新现象。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如王振中研究员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很好的应用与发展。

与会学者一致肯定了这次会议的选题，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因为我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始终坚持了这条道路。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讨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道路，必须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我们过去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未来二十年我们要想实现小康社会的远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我们发展中的问题，继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谢富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00972

联系电话：89195416 13661063301

E-mail: fushengxie@yahoo.com.cn

